

#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资料专辑

(内部参考)

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 说 明

根据上级关于收集、整理我党领导下群众武装斗争的历史资料的指示，我们在整理和编印《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中，有关揭露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经营“第二武装”的罪行和反映上海军民同“四人帮”作斗争等情况，专题编印了七期资料(16~22期)。为便于查阅，我们将这七期资料合订成册。

一九八一年六月

(内部参考材料)

#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十六)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

## “四人帮”在上海经营“第二武装”的始末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 关于编印“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

### 资料的说明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上海为基地，拉起了一支直接听命于他们的帮派武装。为揭露“四人帮”经营这支“第二武装”的罪行，反映上海军民和“四人帮”的斗争，这方面的资料拟从如下四个方面汇集整理：一、“四人帮”在上海经营“第二武装”的始末（综合稿）；二、“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的罪证材料；三、上海军民同“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的斗争；四、“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上述资料，从本期起，将分若干期陆续刊出。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 “四人帮”在上海经营“第二武装”的始末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着“民兵改造”的旗号，以上海为基地，培植了一支脱离党的领导，同解放军相对抗的“第二武装”。这支“以造反派为基础”，以社会渣滓为骨干，由“四人帮”及其党羽一手操纵、严密控制的帮派武装，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上海崛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灭亡，在这十年时间里，充当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罪恶工具。“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支“第二武装”也就随之顷刻瓦解、彻底破产了。

### （一）“第二武装”的崛起

“第二武装”是“四人帮”一伙趁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伪造所谓毛主席“民兵改造”的指示，盗用“上海工人”的名义，拉起来的反动的帮派武装。

一九六七年，在一片“打倒”、“砸烂”、“夺权”的喧嚣声中，“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蛰居在党内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我党所犯的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使我们的党和国家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当时，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全国上下夺权成风，武斗不休，党的组织被搞瘫痪，政府机关失去控制，生产停顿，交通阻塞，大批干部惨遭迫害，恐怖气氛笼罩全国。民兵活动也被迫陷于

停顿。这年的七月二十二日，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在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时，公然抛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局势更加混乱、动荡。当时，反革命分子张春桥，伙同反革命分子姚文元、王洪文，已经在一月反革命夺权中窃取了上海市的领导大权。但是，这个当年拜倒在蒋介石脚下的国民党特务深知，没有枪杆子是无法实现其“改朝换代”的迷梦的。在拉军队拉不动的情况下，即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盗用“上海工人”的名义，于同年七月三十一日，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关于上海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请示》，处心积虑地要推倒原有的民兵组织，重新建立起一支直接听命于他们的帮派武装。张春桥在这个《请示》中提出：“这支由工人造反派组成的队伍，在目前可以制止武斗，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逐步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就是这个“请示”，拉开了“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帷幕，也成为他们以后大搞“第二武装”的依据和纲领。

是年八月四日，由张春桥授意，王洪文出面，借口“防止上海第二次大乱”，“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名义，蒙骗煽动数万名造反队员，头戴藤帽，手持凶器，用暴力手段砸了持不同观点的另一造反组织——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这次行动，实质上是“四人帮”筹组“文攻武卫”队伍的序幕。

“八·四”砸了“上柴联司”后，“四人帮”一伙加快了筹组“第二武装”的步伐。八月二十六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决定成立“文攻武卫”队伍。在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上召开的市革会常委会上，又对“文攻武卫”队伍的

性质、任务、名称、体制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打算”和“规定”宣称：“文攻武卫指挥部受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建立文攻武卫队伍是为了“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凡已建立起文攻武卫队伍的单位，文攻武卫组织就代替民兵的一切活动和工作”。

在“四人帮”一伙的筹划下，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淮海中路1469号（原市妇联机关）正式开张（之后，几经搬迁，最后设置在黄浦路20号<sup>①</sup>），并从第一批筹建文攻武卫队伍的先锋电机厂、国棉十七厂等十二个单位中抽调五千一百二十名文攻武卫队员，脱产集中，加紧操练，以接受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检阅”。一九六七年国庆节那天，当全副武装的文攻武卫队伍，头戴藤帽，胸佩符号，由“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大旗开道，通过人民广场检阅台时，张春桥得意忘形地对其党羽王承龙讲<sup>②</sup>：“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

“四人帮”经营的“第二武装”，从一九六七年八月至一九七〇年五月，统称“上海市文攻武卫”。市设文攻武卫指挥部，其政治待遇，与市革命委员会组办等同。市指挥部机关最初设参谋联络、组织、政宣三个组（七三年以后逐步演变为作战、训练、政工、组织、特兵、后勤、办事等七个组），并下辖若干直属师、团。市内各区设立文攻武卫指挥分部，为市指挥部的派出机构，受市指挥部的直接领导和指挥。当时，在区级指挥分部中，杨浦区最早成立，称市文攻武卫第一分部，简称一分部。以后以成立的时间先后为序，分别称二分部、三分部……。一九六八年七月，“四人帮”在上海掌管公检法大权的党羽王少庸感到国民党也有个区分部，“区分部的名字太难听”，遂改名为市文攻武卫某某区指挥部。各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仿照市指挥部体制，机关设置若干个组，下辖若干团、营、连、排，并公开设置了用于关人

的监房。

在这段时间里，“四人帮”一伙标榜“武装产业工人，建设城市民兵”，只是在市区工交系统选择所谓由造反派掌权的单位发展队伍，市区的商业、教卫等系统以及郊县农村均不作发展对象。相对来说，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间，文攻武卫队伍发展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张春桥在浙江的一次会议上也说：“我们准备搞到十万到十五万人。”但是，在党的“九大”前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出于扩充反革命实力的野心，不顾军队和广大民兵的抵制和反对，通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悍然作出“组织发展工作，要符合战备要求，消灭空白”的指令，加紧扩充帮派武装。据统计，仅一九六九年，就发展了四万一千六百多名文攻武卫队员，是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发展总数的二倍，到一九七〇年三月，已建立了七个师，七十二个团，一百五十一个营，六百二十三个连，共二十一万人。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亲自批发文件，决定撤消文攻武卫组织<sup>③</sup>。当时，全国民兵组织只有上海叫文攻武卫。“四人帮”一伙以“统一全国武装力量名称”为由，于一九七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虹口体育场四万余人的大会上，被迫宣布将“文攻武卫”改名为“上海民兵”。会上，王洪文照例为“第二武装”吹嘘一番之后说：“改变名称并不意味着改变这支工人武装的性质与任务，名称改变了，性质、任务仍旧不变。在斗争中形成的一套干部班子，目前仍然不变，原来怎么干的，今后还是要照样干下去”。市指挥部的头目也跟着鼓噪：“从民兵到文攻武卫是一个改造，从文攻武卫到民兵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事实也一再证明，这次改名是“四人帮”一伙所玩弄的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把戏。“文攻武卫”改名为“上海民兵”之后，不仅性质、任务和干部班子不变，就连市和各区指挥部门口，挂的也仍然是“文攻武卫”的牌子，直

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以后，才换上了“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招牌。

改名之后，“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罪恶活动越发变本加厉。他们在进一步发展帮派武装的同时，还挖空心思地炮制出一些帮派武装的组织形式。其中有：从一九七〇年下半年起在全市各工厂、单位逐步推广的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组织（全面推广是在一九七三年之后）；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开始，由各工厂单位抽调民兵组成的里弄民兵小分队；以及从一九七一年四月起在一些工厂建立起来的各种类型的劳动教育学习班。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人帮”一伙炮制的《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的所谓经验批转全国之后，他们自恃“令箭”在手，把“第二武装”的势力一下子从市区扩展到农村，郊区十个县也都挂起了民兵指挥部的牌子，二百四十多个公社（镇）武装部也都被民兵团部所取代。至此，“第二武装”的触角几乎伸进了市区的每一个工厂、单位、街道和农村的社队。据统计，在“第二武装”覆亡前夕，全市共有民兵三百零九万，计有九个师，六百零二个团，一千二百八十七个营，一万八千七百多个连。不仅装备了步兵，而且装备了摩托、高炮、水上及防化、通讯、工程等各种专业分队。拥有各种枪支二十二万六千余件，火炮一千九百余门，四〇火箭筒二千六百余具，各种车辆五百余台，以及耗资一百多万元建造起来的“上海民兵 101 艇”。

多年来，张春桥、王洪文一伙为了把“第二武装”搞成直接听命于他们的帮派武装，全面践踏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苦心经营到了不择手段、不惜工本的程度。

组织上，推行唯帮是亲的阶级路线。在筹组文攻武卫队伍之初，他们就强调：“以造反派为基础”，明文规定“一定要是老造反的单位”，

才能建立文攻武卫队伍。文攻武卫队员必须是“造反派”战士，如果不是，“就是三代工人，本人是共产党员，八年没缺勤，也不能参加”。甚至说什么，“只要跟我们干，反革命也要”。“文攻武卫”被迫改为“上海民兵”之后，他们仍把有没有造反派掌权作为重建民兵的依据，并规定民兵营以上干部一定要是“老造反派”。他们所说的“造反派”，实际上不少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泛起的社会沉渣。

对于市和各区指挥部的领导班子，他们更是严密控制。王洪文、王秀珍等人亲自掌管指挥部领导班子的人事调配，大搞以帮划线，精心选调为他们所信任的帮派骨干充任指挥部的主要头目。十年间，市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虽然有所更迭，但实际权力一直由“四人帮”及其党羽把持。文攻武卫筹组期间，由翁默清同志临时负责（翁原系××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刚从部队转业下来，尚未分配工作，临时抽来负责），钟定栋<sup>④</sup>、郑惠仪<sup>⑤</sup>两人协助。不久，翁调任它职，王洪文即委派跟他一起造反的打砸抢骨干分子张宝林，与钟定栋、康正勤、郑惠仪、阎波组成核心小组具体负责。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首次成立领导小组，由李彬山<sup>⑥</sup>、张宝林、陆耀华、邢殿英、钟定栋、阎波、郑惠仪等七人组成。李彬山任组长、张宝林为副组长。一九七二年九月，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由上海警备区主管的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组成了新的七人领导小组。当时，李彬山仍旧任组长，吴立义<sup>⑦</sup>为副组长，钟定栋、郑惠仪、阎波为组员。“四人帮”一伙为了掩人耳目，装璜门面，让原野营训练指挥部的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胡守富同志和政治部副主任夏琳同志，分别担任了副组长和组员。张宝林因与王洪文争权，王洪文等人感到难以驾驭，在合并之前，已将其调离指挥部回单位劳动。为了加强对“第二武装”的控制，“四人帮”一伙又分别于一九七三年底、一九七四年初，以及一九七四年的六月

和八月，先后四次从上海总工会系统抽调他们的帮派骨干，充塞到市、区两级指挥部。王洪文的小兄弟、原市总工会常委周宏宝<sup>⑧</sup>、施尚英<sup>⑨</sup>、印玉泉<sup>⑩</sup>，就是分别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和一九七四年二月间调到市指挥部担任主要头目的。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市指挥部领导小组的成员是，组长：李彬山；副组长：周宏宝、施尚英、吴立义；组员：钟定栋、郑惠仪、印玉泉。这段时间，市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先是李彬山、周宏宝，一九七五年二月，周宏宝调任国务院教育部负责人之后，市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为李彬山、施尚英。

政治上，他们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伪造说毛主席有过“民兵改造”的指示。（注：《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评论员文章说，经反复查证，可以肯定：毛主席从来没有作过“民兵改造”的指示。）张春桥、王洪文多次在各种场合大讲：“成立武卫组织”，是毛主席“批准同意的”，毛主席“很关心这支队伍”。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宣传工具，为其经营帮派武装大造舆论。王洪文要上海的报纸“经常报道、定期报道上海民兵”，张春桥也对《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负责人说：“上海形势好，有百万雄师作后盾，你们要好好报道上海民兵”。他们要文艺、出版、新闻等单位以“歌颂”城市民兵为题材，写小说，编剧本，拍电影，撰论文，发消息，甚至指令在中学教课书中也要有反映“第二武装”的课文。他们为了使“第二武装”能够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就阉割、篡改马克思、列宁关于“全民武装”的学说。特别是一九七三年以后，他们别有用心地一再引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引用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以及“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行政机



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等等。他们公然抹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军队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根本不顾我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军队这个根本事实，侈谈什么民兵要把人民解放军的职能，警察的职能和国家的职能结合起来，要用他们的帮派武装取代人民解放军，取代无产阶级的公安、检察、法院等专政机关。市指挥部的头目还亲自编写“文攻武卫斗争史”，编纂张春桥、王洪文民兵工作“讲话”，把张春桥、王洪文打扮成城市民兵的“创始人”。并把搞帮派武装的一套，统统贴上“新生事物”、“新鲜经验”的标签，到处兜售，用以蛊惑人心，制造混乱。

军事上，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的膨胀，一九七四年之后，市指挥部加紧了民兵的训练工作。为了摆脱军事机关对民兵的领导和指挥，他们一再反对总参制订的民兵训练纲要，自定训练大纲，另搞一套什么战役、战略训练，处处撇开军事部门搞所谓的“独立作战”，“自己指挥”。一九七五年夏秋之际，王洪文窜回上海，要“第二武装”“加强战备观念”，“搞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搞战役，战术训练”，还要搞什么城市巷战、丘陵地带和开阔地带的战术训练，民兵干部“要学会指挥”等等。为了所谓“促一促民兵的训练”，王洪文还亲自把市和十个区、两个县指挥部的头头找去一同打靶。

文化大革命前，上海民兵的装备一直是根据战备的需要，由总参谋部根据全国民兵的装备情况订出计划，通过总后勤部调拨，逐级下发的。各省、市军工生产动员线生产的武器也是由财政部和总参谋部下达装备经费指标，由地方财政部门拨款购买装备民兵的。但是，“四人帮”一伙根本无视这些规定，明目张胆地破坏国民经济计划，从一九七〇年起，王洪文就私自在上海电缆厂搞了一个生产武器的点，代号为

“601”车间，生产半自动步枪，并指使其党羽在新中华机器厂生产全自动步枪。一九七三年九月，王洪文又对其安插在市工交组的党羽陈阿大下令，“把三十到四十个工厂装备起来，搞土生产线。”张春桥对这支帮派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备加关注，他吩咐马天水等人“加强”上海郊区造枪、造手榴弹、造地雷的阴谋活动。在张、王的指使下，“四人帮”余党恣意动用大量计划外的经费造枪、造炮、造弹，用于装备“第二武装”。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间，“四人帮”就擅自动用了三千二百多万元的计划外经费，用于“第二武装”的武器装备。他们搞的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的第一年，即一九七五年，武器累计已达他们十年规划的百分之四十四。其中某些武器，如37、57高炮，不仅已经达到了规划数，而且有的已经超过了“十年规划”中应装备的数量。

在领导关系上，“第二武装”直接隶属于“四人帮”，地方党组织和军事部门根本无权领导。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时，“第二武装”由他们直接掌管，张、姚、王到了北京之后，则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代为掌管，张、王等人则实行遥控，重大问题须经他们点头才能决定。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曾向市革命委员会提出过一份《关于指挥和调动文攻武卫权限规定的请示报告》，其中规定：“市文攻武卫的各级组织、各个成员，不论平时或战时，都必须听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领导和指挥”。王洪文也曾多次对他的党羽交代：“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我是抓住不放的”，这支队伍“不能多头指挥”，“不要被人家指挥”。甚至下令，调动一个连，要经过他，调动一个营，要经过张春桥。为了加强对“第二武装”的控制，张春桥、王洪文一伙还袭用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对市指挥部的头目又压又捧，一旦发现他们稍稍偏离轨道，便厉声斥责，“第二

武装”横行这十年间，市指挥部根据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旨意，曾经多次进行所谓的“整风”。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则采取“捧”的一手，利用“接见”“照相”等进行笼络。一九六八年，上海市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张、王亲自把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树为活学活用的典型；一九七一年，上海市召开第四次党代会，他们又专门给市指挥部一个名额，要其派代表出席；一九七三年召开四届人大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又特地从上海市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中，留出一个名额，把李彬山拉入四届人大；一九七五年间，王洪文又特地让施尚英出国参观。江青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了解文攻武卫的情况和送用油莎豆制成的酒，以示“慰问”。所有这一切，都使市指挥部的头目受宠若惊、感恩戴德，更加俯首贴耳地为其经营“第二武装”卖力。

## （二）分裂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篡夺民兵领导权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要害，就是要改变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改变党指挥枪的原则，篡夺民兵的领导权。因此，在拉起“第二武装”之后，他们通过各种报告、总结、谈话，一再强调：“民兵领导体制不能修修补补，要来个大革命”，诬蔑军事系统负责民兵工作是“条条专政”，狂吠“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叫嚷要“砸烂军事一条线”，处心积虑地想把各级人武部、上海警备区以至南京军区、军委三大总部一脚踢开，把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统统夺过去。

作为分裂“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篡夺民兵领导权的第一步，他们首先把原有的民兵组织一刀砍掉。为此，他们编造了种种谬论，把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上海民兵，说成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群众运动一来，一冲就垮”。一九六七年九月，张春桥、王洪

文悍然下令取消市区的八百二十二名专职武装干部，强行停止基层人武部的活动，市区六百五十七个基层人武部被一刀砍掉。各区人武部的工作也陷于停顿。王洪文还摆出一副流氓架式狂叫：“从现在起停止基层专职人武干部的活动，如果谁要恢复活动，我就带头去把它砸掉”。张春桥也恶狠狠地对驻沪三军的领导干部说：“有一点我是不动摇的，上海市区还是文攻武卫，再搞民兵或另外搞一套，我是不同意的，不能搞复旧”。一九六九年九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要建立统一的民兵指挥机构。胡说：市、区两级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是三结合的领导机构，郊区十个县的民兵组织，在重建的基础上，仿效市区建立指挥部，在市革会统一领导下，由市指挥部具体负责抓好人民武装建设，原市区、郊县的武装部可以撤消。”公然否定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领导，妄图一口吞掉民兵工作的基层领导部门。

在“四人帮”一伙眼里，上海警备区是他们分裂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经营“第二武装”的障碍，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们以大砍基层民兵组织为起点，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法，一步一步地剥夺上海警备区领导和指挥民兵的权力，进而大整上海警备区，妄图取而代之。

一九七〇年三月，上海警备区向市革会写了一个《关于组织民兵对外宾进行军事表演的请示报告》，建议成立一个办公室，抓好民兵对外表演工作。可是，市革会却以“不要单独成立办公室”为由，把民兵对外表演的日常工作交给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具体负责。从警备区手中夺走了组织民兵进行对外表演的权力。

一九七〇年底到一九七三年间，“四人帮”一伙又多次进行了剥夺

警备区做民兵工作权力的活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作出了关于野营训练的批示，上海地区的广大民兵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批示，广泛开展了野营训练活动。与此相适应，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以上海警备区为主的野营训练指挥部，市内各区也都成立了以武装部为主的野营训练指挥机构，对于组织指导民兵、大中学校的学生以及机关工作人员，开展野营训练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然而，王洪文却视为大逆不道，说什么：“警备区通过野营训练，又在抓民兵工作了”。为了剥夺警备区做民兵工作的权力，吞并野营训练指挥机构，王洪文等人在一九七二年九月间，借口“精兵简政”，将野营训练指挥部与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并在一起。各区的野营训练指挥部也都分别于一九七一年底至一九七三年间并到各区的民兵指挥部。

但是，事情并未完全按照“四人帮”一伙的意愿发展。合并以后，警备区和各区人武部在指挥部的人员得到了增加。他们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民兵工作路线，积极开展民兵工作，使军事系统做民兵工作的传统有了进一步的恢复。“四人帮”一伙恼羞成怒，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在一九七三年向上海警备区发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夺权活动。这年的七月十四日，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寄来了张春桥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写给毛主席的那个所谓《请示》，并附了一封黑信。信中针对警备区“反对民兵改造”、“不支持新生事物”等问题，说：“敌人的攻击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有些革命同志在对待文攻武卫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并不一致。是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是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实际上是存在着斗争，有些同志的行动和言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信中还指令：“市委、警备区和市民兵指挥部”要“认真讨论一下”。于是，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出面，用一个半天加一个晚上的时间召开市委、警备区党委常委扩大会。市民兵指挥部也专门召开会议，上下呼

应，围攻警备区。他们指责警备区党委、机关抓民兵工作，“是想夺市委对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发民兵工作文件、简报，编写民兵斗争故事是“二元论”，各区派军队干部到指挥部工作是抢“民兵的领导权”。竭力反对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的双重领导制度，不准警备区领导民兵工作。一九七三年以前，郊区的民兵工作还是由警备区负责的，此后，警备区对郊县的民兵工作也不能领导和指挥了。就在他们不择手段地剥夺军事机关对民兵工作领导权的时候，马天水等人还恬不知耻地说：不是不让你们管，是因为你们路线不正。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到处放火烧荒，他们在上海的党羽也跟着点火放炮，把批林批孔作为搞乱警备区，进一步攫取民兵领导权的机会。在运动初期，王秀珍就多次到市民兵指挥部进行策划。她说：这个运动是江青直接指挥的，你们要想些问题，要心中有数，要想得深一点。并交代：批林批孔不能空对空，要联系民兵建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在王秀珍的煽动下，市指挥部的李彬山等人立即行动。钟定栋说：上海民兵建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为什么这样激烈，根子在警备区。周宏宝也到处散布：上海警备区是马蜂窝，要捅。他们又是开会，又是抓点，又是发简报，矛头直接指向上海警备区。在他们的唆使下，市指挥部的一些人冲进警备区机关大院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指责警备区对文攻武卫“不承认”、“不支持”、“搞复旧”。李彬山等人还受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指使，以帮助警备区“端正路线”为名，回到警备区机关搞运动，严重地干扰了上海警备区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并逼着上海警备区把民兵组织、民兵经费和民兵装备权统统交出去。市指挥部的头目整了上海警备区还嫌不足，在运动期间，钟定栋、郑惠仪根据王秀珍的交待，收集整理了一份长达七千字的诬陷南京军区的材料，交马、徐、王转交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提

供整南京军区的炮弹。李彬山等人还组织了十三个军队的“造反派”，在市指挥部集中，策划到南京军区送大字报的具体办法，把反军乱军的鬼火烧到南京军区。在同年九月总参召开的民兵组训会议上，吴立义又大发其难，收集整理了一份有关领导同志对“第二武装”不同看法的材料，交给张春桥、王洪文。张、王看后，利用到会接见的机会，大整中央军委和总部的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并且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在这之后，敬爱的周总理也强调指出：有军分区、人武部嘛，还搞什么民兵指挥部！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在同年七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再次从编制体制上明确了省军区、军分区、人民武装部管民兵工作，坚持和捍卫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对此，“四人帮”更加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地经营“第二武装”。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四人帮”分裂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篡夺民兵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年的九月十八日，王洪文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进行反革命交底，他说：“现在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过去争论的是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将来争论的是组织体制问题，如果否定了组织形式，也就否定了民兵的任务”。他狠毒地说：如果有人把上海民兵指挥部撤了，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二十年后还是要把它改过来。公然要与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抗到底，要向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夺兵权。与此同时，他给在场的党羽交代：“现在是否将人武部和指挥部合起来，抓一二个区、一个县试点一下，把人武

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复退、征兵都可以并过来，人防工作也可带过来。”下令：“试点要抓紧，现在就试。”十月十三日上午，李彬山、施尚英到了杨浦、卢湾区，给两个区的区委领导传达了王洪文关于“四部合并”的所谓指示和指挥部的试点打算。钟定栋也带了人马到上海县去抓试点。在试点过程中，他们说：“这是王副主席考虑了很久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强制人家接受。尽管这样，人武部和人民防空办公室、复退办公室的同志对试点调查组还是提出了种种责问。致使“四部合并”试点难以进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见势不妙，认为合并的关键在于人武部。遂决定“四部合并”分两步走，先搞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的合并。马天水在当年十二月十日召开的两区一县合并试点汇报会上，恶狠狠地对警备区的领导同志说：“机构合并，这是一场组织革命，合并中有斗争，合并后还会有斗争”。蛮横指令“警备区要抓一抓武装部的思想工作，不通不行，半通也不行。”

一九七六年初，敬爱的周总理不幸与世长辞。当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凶，“四人帮”认为时机成熟，加紧进行“两部合并”的步伐。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期间，王洪文对马天水、李彬山等人再次面授机宜，但又怕露了马脚，诡秘地交代说：“两部合并要快，不要等中央批了，你们先搞起来。”马天水从北京回来也跟着说：“你们并起来就是了，不要等批了。”所以，整个试点从开始到结束，王洪文等人从未作过一个正式的批文，都按所谓口头的指示进行。对于这种涉及到军队体制变动的重大问题，既不听取警备区的意见，又不准向南京军区报告，搞的全是阴谋诡计。在“四人帮”一伙高压政策的威逼下，杨浦、卢湾两个区的人武部与民兵指挥部分别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正式合并。合并后，摘掉了人武部的牌子，收掉了人武

部办公的房子，停止了人武部党委的工作，剥夺了军队干部的政治待遇。人武部各个科的人员并到指挥部的各个组，人武部的多数部领导靠边站，只准少数部领导参加指挥部的领导班子。例如：杨浦区人武部当时除部长吴立义已在市指挥部外，还有八个部领导，只有三个参加了指挥部工作，剩下的五个部领导由区委分配搞其他工作。上海县的两部合并，由于人事安排等方面的原因，在“第二武装”垮台之前，没有来得及宣布正式合并，但实际遭遇和杨浦、卢湾两个区人武部基本一样。“四人帮”搞“两部合并”试点的目的，就是妄图在全市铺开，进而推向全国，就是要用他们的民兵指挥部吃掉人武部，以便从下到上、由点到面地把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都统到他们手里。

“四人帮”不仅要夺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而且要把公安机关和治保组织等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统统抓到手里。他们明知华国锋同志多次作过公安机关不要推广“三位一体”的指示，还是强行在基层推行。同时，还大批“治保一条线”是什么条条专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制订的公安治保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全市百分之九十八的工厂、企事业单位搞起了“三位一体”。嘉定、金山两县的一些大队也进行了所谓试点。一九七五年间，施尚英等人还根据马天水提出的“下面三位一体了，上面怎么办”的所谓指示，炮制了一个把区公安分局治保科、经文保科的大部分工作和消防队的全部工作并到民兵指挥部作战组的方案。由于公安部门广大同志的抵制才未得逞。很明显，“四人帮”一伙推行“三位一体”，就是要用“第二武装”来取代公安机关和治保组织，为他们实行封建法西斯准备条件。

“四人帮”改变民兵领导体制，篡夺民兵领导权的阴谋和野心不光是上海的一城一地，而是妄图扩大到全国。王洪文直截了当地讲：“体制问题，不光解决上海问题，是解决全国问题。”为此，他们多年来奉

行的反革命策略：一是从基层搞起，造成既成事实，以此来要挟中央，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先把基层搞好，然后逼着上层建筑改革”，“主席批了，谁也不敢反，谁也没有话好说了”。二是从上海搞起，然后推向全国。十年间，“四人帮”先后掀起了两次向上海“学习”的活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四人帮”操纵舆论，大肆宣传文攻武卫的“成果”与“经验”，使黑龙江、陕西等三十七个省、市、地区革委会、群众组织的代表专程来访。第二次发生在“四人帮”一伙炮制的《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的所谓经验发表前后，全国除西藏外，先后有四十九个地区派遣七百一十七人到上海来“取经”。他们甚至提出：要形成从基层到中央的独立的民兵指挥系统。要建立同国防部并列的“全国民兵总指挥部”，并且要王洪文当“总指挥”。胡说什么“还是建立两支武装好，一支是军队，一支是民兵，相互可以牵制”。这一切事实说明，“四人帮”是破坏、分裂我国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妄图用武力篡党夺权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

### (三)打着所谓“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的旗号，大搞法西斯专政

江、张、姚、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竭力篡夺党和军队对民兵领导权的同时，还从根本上篡改民兵的性质、任务，妄图把民兵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十年间，“四人帮”及其党羽打着“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旗号，驱使“第二武装”“走上社会”、“杀向党内”，把矛头指向广大人民群众，指向各级革命领导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武装”横行期间，全市各区、县私设监房的面积达九千七百多平方米。先后抓、关了十万四千二百九十五人次。在被他们抓关的人中，除少数确有罪行应由专政机关依法惩处外，绝大部

分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是无辜群众，有的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惨遭迫害。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狰狞面目。

纵观十年间，“四人帮”动用、驱使“第二武装”大搞法西斯专政，大致可分这样三个阶段：

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七一年间为第一个阶段。在这近四年的时间里，“第二武装”搞法西斯专政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市区。在当时的上海，不分白天黑夜，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手执长矛、头戴藤帽的文攻武卫队伍，在黄浦滩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们砸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搞武斗，“刮台风”，随便抓人，干了许多坏事。仅从如下几例，便可略见一斑。

一是所谓“一二·七革命行动”。这是由“四人帮”导演，对抗中央，稳住上海，搞乱外地的一幕丑剧。市指挥部头目也一再吹嘘这是文攻武卫队伍的第一仗。他们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起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止，先后出动五千多名文攻武卫队员，一千多名大专院校红卫兵，查封了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省市的地、县、厂矿企业驻沪办事处共六百三十一个，查封房屋面积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二平方米。事情经过是：文攻武卫成立不久，张春桥就下令对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查封。王洪文等人组织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一些头目，拟订了一个《一一·二五工程方案》，对行动步骤，注意事项，组织领导及分工等作了详细规定，明确由王洪文、王承龙等人任总指挥。从十二月七日那天起，文攻武卫队伍按原定方案闯进了各驻沪办事处，把办事处的人员软禁起来，大搞打砸抢。然后由“文攻武卫指挥部”出面，搞了个所谓“查封沪办”的情况《简报》。在《简报》里，采用偷梁换柱、以假乱真的卑鄙手法，把有的省市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早已封存的资

本家的股票、保险金单据、帐本、地契、家谱等，都说成是“变天帐”；把上级发的工作电台，说成是“敌特电台”；把警卫武器和原来封存的报废枪支，说成是“私藏武器”。于是，对各地驻沪办事处分别按上“资本家的联络站”、“牛鬼蛇神的避风港”、“逍遥派的安乐窝”、“两地走资派的政治交易所”等罪名，全部予以查封。对外地驻沪办的工作人员限时限刻强行遣送回去。事后，张春桥对他精心策划的这次行动十分得意，他说：“不那样子就抓不到人”，“过去文攻武卫没啥影响，查封沪办后，杀出了威风，权威就树立起来了”。在查封各地驻沪办事处之后不久，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又参与了对全市五十七处宗教庙宇房屋的查封接管工作，查封房屋的面积达八万一千平方米。严重破坏了党的宗教政策。

二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革命群众掀起了揭露张春桥罪恶历史的浪潮，它击中了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要害，动摇了“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上海的地位，使得这伙反革命黑帮十分惊慌。市指挥部组织机关人员，兵分三路，观察形势，搜集社会动向，伺机抓人。第二军医大学有个同志在南京路上刷标语，被抓到市指挥部，摘帽徽、扒领章，肆意侮辱，残酷体罚。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在炮打张春桥事件中，书写“谁在上海搞独立王国，决没有好下场”等标语口号，市指挥部发现后，就专门提出报告，将其送到公安局拘留审查。事后，市指挥部又将在四月十二日那天对张春桥一伙斗争坚决的单位，一一记入黑账，按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严密监视，横加迫害。

这一时期，“四人帮”一伙还伙同林彪死党王维国，先后成立了所谓“联办”<sup>①</sup>“维办”<sup>②</sup>等机构，大刮所谓的“红色台风”。从一九六九年七月下旬到九月底二个多月的时间里，“维办”就先后搞了九次大的清查活动，出动了十四万多人，抓了三千四百四十二人。就在“维

办”成立后的第五天，即七月十九日那天下午六时左右，经王洪文亲手布置，借口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出现围观外国人事件，在原海员俱乐部和友谊商店门口，采用事先设下埋伏，接着放爆竹，吹喇叭招引群众围观，然后包围抓人的办法，一下子抓了三百九十九人，其中有孕妇、儿童、七十多岁的老人和报社记者，全部押到交通大学逐个审问，稍有不和反抗者，便拳打脚踢，棒敲棍打。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这个阶段，“四人帮”一伙驱使“第二武装”大搞法西斯专政进一步升级。他们从原来一般只在面上刮台风、搞清查，发展到派遣民兵小分队进驻街道里弄；从原来只在市区抓“阶级斗争”，扩大到郊县也抓“阶级斗争”；从原来的所谓“执法”发展到要“立法”，还胡说要搞什么“管法”。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上海市委作出了“上海民兵要主动深入地区抓阶级斗争”的所谓指示。闸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迅即从十三个工厂单位组织了十三支民兵小分队，于同年四月十六日，进驻十三个里委会，配合街道抓“阶级斗争”，市指挥部立即肯定“这样做很好”，“希望各区指挥部经常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这年的七月六日，王洪文在《解放日报》社编的《情况反映》上，对上海电梯厂派出民兵小分队进驻街道里弄一事，也作了充分肯定。要求：全市民兵都能象上海电梯厂民兵那样，协助街道、里弄、学校，对青少年加强教育。一时间，各区指挥部纷纷仿效，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成风。据一九七四年八月统计，当时全市共有民兵小分队一千二百一十九支，除五个里弄没派外，其余都派了民兵小分队。共有队员三千五百多人。这些民兵小分队名义上以抓青少年教育为主要任务，后来实际上几乎包揽了当地派出所除了户口以外的全部工作。“第二武装”的头目也自诩他们是“不挂牌子的派出所”。

几乎就在首批民兵小分队进驻街道里弄的同一时期，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又指令各区指挥部，把在押的所谓没有改造好的人放到工厂实行长期改造。在不长的时间里，全市各区就办起了四十多个边劳动、边改造、边审查的“三边”学习班，这些“三边”学习班，既关人，又审讯，既立案，又办案，把公安局、法院等部门的职能集聚一身，严重地干预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之后，市指挥部的头目还专门在红色线厂办了劳动教育学习班的点，并布置十个区和六个国营农场，建立了五十多个劳动考察教育学习班，把过去历届遗留下来，因有这样那样问题没有分配的一万多名青年放在工厂和农场，叫民兵看管起来，名曰考察，实为强制劳动，把犯有一般错误的青少年也当作专政对象对待。

一九七三年十月，“四人帮”一伙为了把法西斯专政从市区推向农村，指派钟定栋到上海县新泾地区搞农村民兵学城市民兵的“试点”。钟定栋一到那里就宣布，这是马天水的“点”、是王洪文的“点”，是通天的“点”，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试点计划，强令县、社（镇）党委执行。在点上他们挂出了民兵团部的牌子，搭起了由他们直接控制的班子，造了关人的牢房和打人的棍子，撇开公安部门和法院，明确提出把抓人、关人、审讯、定案作为试点的主要内容。在他们的坐镇下，不到一个月，就搞了一次冲击，抓了一批人。对此，马天水十分欣赏，说新泾地区“试点”是“旗开得胜”。李彬山也一再要求市指挥部总结、转发上海县民兵抓“阶级斗争”的经验。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市指挥部和市革会郊区组联合召开了郊县民兵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上海县介绍了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李彬山作了“关于郊县民兵抓阶级斗争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发言，妄图把法西斯专政的罪恶活动进一步向农村推开。

“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上海县抓点的结果，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个县被抓到社（镇）民兵团部和县民兵指挥部“管教站”经过各种形式处理的共有九千七百六十名，占当时全县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八。全县二十四个社（镇）均设有“监狱”，甚至有的生产队也私设公堂。钟定栋亲自抓的新泾公社，共抓人一千八百九十四名，当时应作戴帽处理的仅四人。他们依仗帮派武装，抓人名目繁多，关人穷凶极恶，打人不择手段。邻居纠纷，要抓；小青年在田野里捉蟋蟀，要抓；对帮派武装态度生硬一点，要抓；连在公共场所说几句公道话，也可以给你定个“无理取闹”的罪名抓起来。他们对被抓来的人，施行种种令人发指的残酷肉刑，什么捆绑、吊打、上手铐、跪砖头、闯马桶、喷气式、晒太阳、烟头烫、含萝卜、喂蚊子、罚立罚跪……，无所不用其极。先后有五人在法西斯暴行下被活活折磨死去。

随着民兵小分队的进驻，各种类型劳动教育学习班的建立，以及郊县民兵也抓起所谓的阶级斗争，“第二武装”要求立法、管法的胃口也就越来越大。一九七四年间，钟定栋曾公开讲过：“我们民兵现在光是执法是不够的”，“我们自己要立法，立法后还要管法”。为此，“第二武装”炮制了帮规、帮法，仅见诸文字有案可查的帮法就有两个：一是一九七四年七月制订的《上海民兵城市里弄小分队暂行工作条例》，这个条例对民兵小分队的组织、任务、职责、制度等作了具体规定，如里弄小分队的首要任务是“抓好社会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二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制订的《关于上海郊县民兵在抓阶级斗争中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郊县民兵指挥部在抓阶级斗争中拥有“冲击”权，拥有“对现行对象受理和处理”权，拥有对在押对象“审查处理”权。市民兵指挥部还印制了查询证，随意进行抄家、冲

击、拘留、捕人；进行非法的审讯、定案和判刑。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地篡夺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的行径，马天水还美其名曰：“是工人阶级用马列主义占领法律阵地。”

一九七六年为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四人帮”抓“阶级斗争”来了一个转折，他们要“第二武装”“不要光抓流氓阿飞”，要“把精力转过来”，“同党内资产阶级斗”。把专政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妄图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为此，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专门印发了一个文件，说“今后民兵的主要任务……更重要的是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把斗争的矛头、主攻方向对准党内资产阶级”。在此之前，他们还组织人员编写了“搞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明确民兵的主攻方向”，“同党内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坚决与走资派对着干，巩固和发展民兵建设上的新生事物”等三课讲话提纲，发下去作为对民兵进行“路线教育”的材料。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也四出活动，煽风点火，要人们“想得深一点、远一点”，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负责同志。马天水在这年的六月十七日也特地跑到静安区旅社中心店，说旅社民兵“与党内走资派斗争是重点，是我们抓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方面。”之后，他要市指挥部进一步总结推广这个旅社的经验，不择手段地要在地旅客中揪所谓“走资派”。钟定栋在这个旅社中心店炮制“经验”的过程中，十分露骨地说，“最好揪县委书记以上的，实在没有，找个大队支部书记也好”，硬逼着这个旅社中心店的民兵干部对十六家旅社逐个打电话查问，并一家一家地上门去找。在实在找不出来的情况下，他们竟然想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造”一个出来。遭到旅社职工和民兵的坚决抵制。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四人帮”一伙，一方面对人民实行残酷



的镇压；另一方面，对地痞、流氓和不法之徒，则多方保护，备加照顾。王洪文的“五虎将”之一的马振龙，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案发后，王洪文指令文攻武卫指挥部对其进行保护。过了不久，“四人帮”又把这个家伙请了出来，拉进党内，加官晋爵，委以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的重任，成了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的岳父林汝祥，是个一贯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奸淫妇女的流氓恶棍，群众强烈要求将他依法制裁，公安部门也要求审理。王洪文却要民兵指挥部假拘留真保护，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最后，反诬革命群众“无中生有、制造谣言”，把这个坏家伙的罪行一笔勾销。

“四人帮”动用“第二武装”大搞法西斯专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是他们还散布种种谬论来为自己的暴行辩解。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民兵的威望是打出来的”，“民兵在全市所以有威信，基本原因，是民兵参加了全市的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这一条，这个队伍的生命就不会很长了。”一再攻击不能动用民兵武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定是“屁话”。他们把人打死了、逼死了，还说是“扶植新生事物，总要付出点学费么”，“黄浦江那么大，又没有盖子，要自杀有什么办法呢。”甚至当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公布以后，“四人帮”一伙还继续驱使“第二武装”抓人、关人。铁铮铮的事实，彻底暴露了“四人帮”所谓抓社会阶级斗争的狰狞面目。

#### (四)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根本目的，就是阴谋用武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们以加强“战备”为名，多次动用“第二武装”进行了反革命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四人帮”大造“军队不如民兵”、“军队

靠不住”的反革命舆论，市民兵指挥部的头目周宏宝也跟着鼓噪，胡说“现在关键问题，出问题就可能在军队”，“从几千年历史看，只有叛将，没有州官造反”。市指挥部根据“四人帮”的指令，炮制了一个调动一万民兵，人车枪弹配套，队伍留厂待命的战备方案。这个方案，经王秀珍亲自审查批准，极其秘密地实施了三个月。这一年的“五一节”前夕，他们紧急调动杨浦区的二百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到黄浦路20号集结待命，调动徐汇区正在野营拉练的二百个民兵到所在区的革委会大院集结待命，并要在上海警备区附近的长宁、静安两个区的民兵作好集结的准备。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军队。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矛头直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及其党羽极端害怕革命烈火烧到上海，搞乱他们反党夺权的基地。从四月一日至四月七日，王洪文几乎天天同马天水、王秀珍通电话，要他们“把民兵拉出去”，“防止上海出现类似天安门广场事件”，王秀珍遂召集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以及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总工会的叶昌明、工交组的陈阿大、财贸组的黄金海、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和市委组织组的王日初等人到东湖招待所密谋策划，部署公安、民兵两家制订“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市民兵指挥部和市公安局立即搭起了班子，根据所谓“局部地区出现情况”、“事态可能扩大的情况”和“事态严重时”的三种设想情况，分别炮制了代号为“反击一”、“反击二”、“反击三”的三个反革命行动方案，每天命令一万余名民兵，二百多辆汽车值班待命。市和各区指挥部还根据李彬山提出的“战备值班队伍可以用拉练形式拉出来，看一看是否有战斗力”的意见，在各区频繁组织“民兵夜间拉练”。王秀珍、叶昌明、钟定栋等人还亲自到人民广场看望拉练队伍，以示鼓励。

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主席病重和逝世前后一段时间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利用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巨大困难，加紧培植“第二武装”，进一步加快了阴谋用武力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步伐。

在“四人帮”的授意下，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根据王洪文“要尽快把上海民兵武装起来，一旦有事好用”的交代，加紧发放武器，装备“第二武装”。这一年的六月中旬，王秀珍对施尚英和薛干青说：毛主席不接见外宾是有内容的，这个你们可以想象的，有些话我在喉咙口，不好讲出来。谈话中，施尚英向王秀珍请示武器发放问题，王秀珍说：“你们赶紧打报告给市委”。六月二十八日，市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关于武器分发的请示报告》，根据以往“用旧存新”的原则，提出把二万一千支全新的自动步枪入库，只下发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轻机枪和六三式六〇迫击炮。七月三日，马天水打电话问施尚英：为什么全自动步枪不下发？并指示：全部下发，不必入库。八月十日，施尚英在市委开会，问起发放武器报告的问题，马天水发现对市指挥部分发武器的报告还没有批下去，就对办文的秘书大发雷霆，说：“我关照过的，这么重大的事情，给你们耽误了”。并一把夺过这份报告，用铅笔重重地批了“立即发”三个字。接着，他又对在一旁的施尚英说：“明天就发”。就这样，从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他们突击发了步枪七万三千多支，机枪二百挺，八二迫击炮三百门。在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从凌晨三时到二十三时，仅二十个小时，又发出了各种子弹六百余万发，炮弹一万五千多发。这个时期，“四人帮”在南京的代理人丁盛（南京军区原司令员），也借机窜来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透露了南京地区部队的情况，要他们“有所准备”。丁盛的交底进一步增强了马、徐、王加紧装备“第二武装”的决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一九七六年五月之后，“四人帮”一伙就多

次赤裸裸地对其党羽进行武装叛乱的煽动工作，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陈冀德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在思想上进一步为武装叛乱创造了条件。九月底，张春桥又特地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马、徐、王传达他的意见。张春桥要在上海的党羽“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并示意，现在有人“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发出了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指令。十月六日，党中央、华主席顺乎民心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伟大胜利，势所必然地使“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惊恐万状，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狗急跳墙，妄图凭借“第二武装”，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由张春桥、王洪文策划，徐景贤、王秀珍等具体组织指挥的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从十月八日起到十四日止，前后共七天时间，这帮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多次召开黑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部署兵力，妄图负隅顽抗，狂叫：十年心血在于此，表示要与党中央、华主席决一死战。作了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等人经过多方刺探情况，在认定“四人帮”被扣，马天水去北京开会（马是十月七日跟周纯麟同志一起到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又联系不上的情况下，召开会议，进行反革命部署。下午二时十五分和三时，徐景贤、王秀珍分别召集警备区的李彬山、张宜爱和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室（简称“康办”）开会，交代“任务”。会上，徐景贤、王秀珍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发生

了宫廷政变，三个领导（张、姚、王）被抓，马天水可能被软禁。他们指令公安、民兵加强战备，并统一了向下布置的口径。当时，由王秀珍口授下达了“加强战备”的指示：“市委检查了发现有的单位战备有些松。战备工作不能放松，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注意空投、空飘、海漂，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突然袭击，检查我们战备工作思想有无松”。之后，王少庸详细地查问了民兵战备情况、武器、弹药数字。当他们知道民兵手中弹药不多，就进一步问，仓库在哪里？施尚英说：“在警备区”。王少庸又问：“打起仗来，能拿得出吗？”施尚英说：“靠不住，但还有路子，有两个工厂（四新、环球锁厂）库存大约八百万发”。王秀珍连忙说：“你们现在就要抓紧准备”，“要准备独立作战”。会上，还明确了“战备行动”听徐景贤、王秀珍指挥。

当天晚上在“康办”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接到“老娘心肌梗死”，即“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密报，判断“下一步可能要对我们动手，形势严重”。市委写作组的头目朱永嘉第一个跳出来：“中央肯定发生了军事政变”。并说：“困兽犹斗，我们得准备斗，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就打五天、三天也好，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让全世界知道”。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跟着说：“除民兵以外，还要把解放军也动员起来”。他分析了警备区的李彬山、张宜爱（上海警备区原副司令）、杨新亚（上海警备区原副司令）、李仁斋（上海警备区警备师原师长）的情况，认为“可靠”，提出“要把这四个人拉在身边，万一有事，好调动部队”。张敬标说：“现在问题很严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就要对着干”。接着，由徐景贤、王秀珍和冯国柱（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会副主任）、张敬标（原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负责人）商量后决定，市委领导班子兵分三路。徐景贤当即开列名单宣读：第一路

由徐景贤率领，成员有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叛乱的舆论准备，秘密指挥点设在丁香花园，代号为一号点；第二路由王秀珍率领，成员有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廖祖康等，直接指挥武装叛乱，秘密指挥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后转移到东湖路招待所），代号为二号点；张敬标自己提出在康平路办公室留守和负责两个点的联络为第三路。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十一点半。散会前，徐景贤写了两张手令给王秀珍。一张是：“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在另一张上，开列了要召集的一些人的名单和王秀珍一路指挥班子的名单。

八日深夜，“康办”的会议结束之后，徐景贤带着王少庸、张宜爱等人在一号点上继续密谋。王秀珍带着冯国柱、廖祖康、市妇联的汪湘君、警卫处的康宁一等人来到市民兵指挥部。正在李彬山家里具体策划武装叛乱作战方案的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得知王秀珍要去市指挥部的消息后，已经提前赶了回去。杨新亚、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总工会的王明龙、沈涵，以及吴立义、印玉泉、翁默清等人接到通知后也陆续赶到。王秀珍给他们介绍了情况之后说：肯定出问题了，把文化大革命出来的“中央领导”都抓起来了，我们要同他们干。接着，要施尚英等人立即部署兵力，廖祖康还要施尚英，赶快拿出地图，研究叛乱部署。王秀珍鬼鬼祟祟，再三交待，我们的指挥点在东湖路，你们指挥部目标太大，要另外选两个指挥点。根据王秀珍等人的旨意，施尚英、钟定栋、吴立义、印玉泉和作战、后勤组有关人员，又进一步研究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方案，把在李彬山家里商量的措施更加具体化了。他们确定了基本指挥点和预备指挥点，具体研究了第一批、第二批的应急力量，规定了通讯联络手段和联络暗

号。同时要求兵力相对集中，领导成员作了分工，向各区派出联络员。确定杨浦、徐汇、普陀三个区为重点区。研究后的情况，由施尚英向王秀珍作了汇报，王表示同意。

十月九日零点，电台广播中央出版毛选五卷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两项决定，徐景贤对王少庸说：“发这两个决定的做法很坏，他们捞了稻草，看来是个阴谋。”对华主席肆意恶毒攻击。九日凌晨二时半，徐景贤接到廖祖康从市民兵指挥部打来的电话，说王秀珍、冯国柱同李彬山、杨新亚商量，要加强电台和市委机关的保卫，把两个警卫连队分别交给广播电台的头头刘象贤和“康办”指挥。徐景贤随即给李仁斋下达了把驻电台的一个连和驻“康办”的一个连改属刘象贤和市委办公室指挥的手令。

十月九日上午，施尚英等人按照徐景贤、王秀珍的布置，召开了十个区、五个民兵师的所谓紧急战备会议，以“加强战备”为借口，对下作具体部署。会上，施尚英传达了王秀珍口授的“加强战备”的指示，按照八日晚上研究的方案，要求各区指挥部和五个民兵师进入一级战备。临结束时，有的区提出是否要向区委汇报，施尚英讲：“不要报了”。在会上，吴立义也大耍花招，说这次战备，部队与民兵各不相干，互不搭界，部队归部队，民兵归民兵。会后，施尚英、钟定栋带着市指挥部作战组组长章金根等四个人，到了设在江南造船厂的基本指挥点。吴立义、印玉泉带着市指挥部后勤组组长张福男等两个人到了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的预备指挥点。指挥部机关由办事组组长陈振安带着朱堃巨留守，负责上下联络。派往十个区的联络员也随即出发。施、钟、吴、印分手时，还规定了联络暗号：规定如有重要情况联系，就说有人要买照相机。在黑据点里，施尚英、钟定栋等人身藏手枪、匕首，指使报务人员架设电台于九日十八时与各区沟通了联

络。当时，市与各区(含部分民兵师)开设了十五瓦电台十五部。各区以下单位动用和备用电台五十八部。各区(师)上报的第一、第二梯队兵力共有二万八千余人。停泊在江南造船厂码头的上海民兵101艇，也架起了高射机枪，配足了弹药，设置了电台。一派箭上弦、刀出鞘、杀气腾腾的景象。

九日上午十时许，王秀珍听到马天水在电话里说：“中央三位领导(张、姚、王)身体很好，就是工作忙些”，并要上海对中央的两项决定和十五号文件热烈表态。徐景贤、王秀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四人帮”可能已取得胜利。为了避免发生所谓的“误会”，王秀珍打电话给施尚英：“撤消五位数(即准备的后备民兵三万一千人)，保持四位数(即值班的二千五百人)。但是，当天晚上九时，党中央让马天水打电话给上海，要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参加会议。党中央这一釜底抽薪的英明措施，对牵制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上海的武装叛乱阴谋活动处于群凶无首的状态。

十月十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开会。徐、王走后，留在上海的一些党羽上窜下跳，还在积极准备“干”。叶昌明在工人文化宫、东湖招待所等处秘密活动。原市委常委、市工交组主要负责人黄涛与廖祖康等人在东湖招待所的秘密据点里，频频接触，继续策划叛乱活动。薛干青、徐成虎从公安局消防总队拉出三百人，作紧急集合演习。还通知交通处负责人，组织机动中队的民警进行联合演习。并准备把武装民警和其他机动力量也拉出去演练。施尚英、钟定栋、吴立义、印玉泉等人也多方刺探消息，分析形势。当他们发现警备区去南京军区开会的领导，只有李宝奇政委一人于十日首先返沪，而且一回来就立即布置战备。认为：警备区这个战备，看来是针对他们的。钟定栋还在十二日下午登上101艇。从电台看到高射机枪，从客

舱看到指挥台，边看边问：船上的高机有多少枪弹，电台能不能用，转移到船上通信怎么搞。并讲：“我们有了这条艇好处很多，如有情况，可以在水上指挥。”

十月十二日晚上八时许，“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党羽麇集在市委常委学习室开会。到会的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原市委的四个常委，以及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马振龙、朱永嘉、王日初、王知常、何秀文、廖祖康、肖木等人。此时，他们已完全证实“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要破釜沉舟，垂死挣扎。会上，朱永嘉站起来歇斯底里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马上干”，“要马上派民兵占领报社、电台，起草‘宣言’、‘告全国人民书’，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组织工人上街游行，停止生产，这样一来，上海马上会乱，只要坚持一星期，迫使他们（指党中央）把四个人放出来”。马振龙声泪俱下地说：“毛主席逝世时，我们都没有哭过，这次忍不住了。我们一定要干，干也是杀头，不干也是杀头”。王知常（市委写作组的另一个头目）也说“这个事，八号搞就成功了。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否则就会一个一个被收拾。”陈阿大跳起来说：“要干马上干”，“只要把电网拉下来，一断电，上海马上瘫痪，控制住铁路、机场、码头，用卡车往跑道上一堵，开艘万吨轮在吴淞口一放，机场、航道就控制起来了”。施尚英表示：“干，我同意”，“民兵要用市委名义调，民兵听市委的”。会议期间，施尚英急急忙忙打电话给钟定栋，要他们进一步拟制反革命叛乱的作战计划。这个黑会，吵吵嚷嚷，一直开到十三日凌晨二时许。最后由冯国柱宣布常委意见：“干是一定要干的，我同意大干，现在各路、各方面积极准备好干，等他们三个领导（马、徐、王）回来后再统一行动”。

当天晚上，钟定栋在江南造船厂指挥点上，按照施尚英的要求，找来有关人员，在王秀珍批准的初步方案的基础上，亲自标图、口授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方案规定了重点保卫目标，布置了两个梯队八千余人和一百辆卡车、一个摩托团（三百五十辆摩托车）的机动兵力，还有指挥核心的形成、弹药补给、通讯联络、社会治安等。方案并规定在上海与江、浙交界上海境内的浏河、葛隆、安亭、金泽、枫泾、金丝娘桥设六个控制点，形成外围控制圈。并在市区内再设二道控制圈。方案从十二日晚上一直搞到十三日凌晨二时。交印玉泉看后，又作了修改补充。钟定栋在重点目标方案上题名为“捍一”，在外围控制方案上题名为“方二”。十三日凌晨二时半，施尚英回到江南厂指挥点，召集钟定栋、印玉泉、章金根等人开会，施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在市委研究时，对着干的思想是一致的”，钟定栋卷起袖子第一个表态：“干，准备杀头、坐牢”。

在十二日这一天里，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王洪文的“五虎将”之一）、王明龙和廖祖康等人还研究布置起草了“一月革命精神万岁”、“决不允许苏联复辟的教训在中国重演”等十七条叛乱用的标语口号。十三日上午，叶昌明、沈涵、王明龙、马振龙、黄金海、唐行南等人在市总工会，对已经打印的十七条反动口号，修改增添成二十一条，准备在叛乱时呼喊、张贴。

十月十三日上午，到中央开会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志（现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返回上海，马、徐、王也同机到达。这天凌晨，市总工会和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策划布置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反革命“吹风”。上午，施尚英、钟定栋等人还分别回家安排后事，同家人“诀别”。在市指挥部坏头头的唆使下，一些区指挥部的头头也加紧策划。有的发出“虹兵一号战斗命令”，叫嚷要“上山

打游击”，并腾出班房，准备关押反对他们的人；有的下令把机枪架到四楼屋顶上去，“一有情况就好扫”；有的给摩托连装备了机枪、冲锋枪，压上子弹，在外“巡逻”；有的下令基层单位的民兵“带武器弹药、车辆要加满油，做好行动准备”。

十三日下午三时，朱永嘉、王知常仍贼心不死，继续煽动武装叛乱。王知常打电话给黄金海、施尚英，问他们准备得怎么样了，说要动，四点钟以前还可以动，再晚就不行了，白天闹起来，群众都在外面，部队即使来也不好开枪，时间晚了，群众跑回家去，部队就要开枪、抓人了。

十月十四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逐步传达到上海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四人帮”的党羽眼看大势已去，才被迫收起了武装叛乱的摊子，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一经传到上海，“四人帮”党羽预谋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也就彻底破产了。他们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第二武装”连同它们的主子，被一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 （五）上海军民对“第二武装”的斗争

上海民兵是在党领导下的、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群众武装。同“四人帮”搞的以“造反派”为基础，以他们一伙小兄弟为骨干，由他们几个余党亲信指挥的帮派武装，毫无共同之处。上海民兵与“第二武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第二武装”横行期间，尽管他们伪造了毛主席指示，利用了种种合法身份，采取了种种欺骗和高压手段，但是，上海的广大民兵、人武干部和军队的同志，还是时时和他们展开

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早在“四人帮”拉起“第二武装”之初，上海的驻军和民兵针对“四人帮”要用文攻武卫组织来改造和重建上海民兵的罪恶目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当时，上海警备区的一些领导同志义正辞严地指出：“提‘改造’民兵，是篡改毛主席的全民皆兵思想”；“提‘重建’民兵，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工作”。指出：张春桥拼凑文攻武卫队伍，搞的是“私人武装”。上海先锋电机厂等单位的民兵同志说：“大办民兵师是毛主席指示的，文攻武卫不能代替民兵的任务”，“我们已参加了民兵，不参加文攻武卫”。有些工厂的民兵还当着市指挥部工作人员的面说：文攻武卫队伍，在关键时刻枪筒子是否转向，我们不放心。上面提到的先锋电机厂，在当时是被市指挥部选作筹组文攻武卫队伍的试点单位，但这个单位的广大民兵也显示出高度的觉悟。可见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在上海广大民兵中是有深刻影响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张春桥、王洪文擅自下令取消专职武装干部，停止基层人武部门的活动，不少军队同志和专职人武干部就说：武装部是不能撤消的，专职武装干部是有任职命令的。对“四人帮”的霸道行径表示非常的不满和反对。上海警备区不顾“四人帮”的淫威，继续组织他们开展活动。为此，一些专职武装干部讥讽“第二武装”：“你们文攻武卫不要我，上级还是承认我的，你们没有权力不承认我”。一九七二年间，上海警备区政治机关还专门开会，布置调查文化大革命前任命的专职武装干部情况，积极准备组织他们开展活动。

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间，围绕讨论修改《民兵工作条例》，上海警备区机关在总参谋部和南京军区的支持下，又与“第二武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市民兵指挥部想以指挥部身份挤进修改条例的班子，警备区就坚持以军队人员为主、以军队名义组织人员；市指挥部

想推翻原有条例，另行撰写，警备区就坚持以原有条例为基础进行修改；市指挥部想要条例“反映”、“肯定”“第二武装”的“新生事物”和“新鲜经验”，警备区就一再划掉“三位一体”、“民兵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之类的提法；市指挥部为谋取合法身份，想在条例中写上“民兵指挥机关”，警备区就明确表示，人武部就是人武部，驻军就是驻军，有了县、市人武部，还要什么民兵指挥机关。最后，这次条例的修改工作，经过军区、总参汇稿，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只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阻挠，没有得到颁发。但是，军事部门和广大民兵与“四人帮”斗争的事实却得到了真实的记录。

多年来，“四人帮”竭力攻击不能动用民兵武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规定，公然违背宪法，动用驱使“第二武装”大搞法西斯专政。对此，广大民兵和军队同志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他们时常据理力争，驳斥“四人帮”的卑劣行径。一九七三年间，上海警备区根据公检法逐步恢复的情况，提出：公检法已经恢复正常，民兵不能再搞抓人关人审讯这一套。徐汇区武装部根据警备区负责同志的意见，认为：指挥部抓人办案不是方向，小分队不能代替派出所。积极准备把关押对象交出去。南市区也调了十六名公检法人员到区指挥部准备接管。不少民兵同志离开指挥部，回到原单位工作。后来，张春桥、王洪文等继续动用“第二武装”大搞法西斯专政，在指挥部工作的军队同志就采取“软磨”的办法，借口解放军抓人不大方便，尽量保护人民群众。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公布以后，尽管“四人帮”一伙竭力歪曲宪法的原意和精神实质，上海军民还是努力按照宪法的规定办。深受“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之苦的上海县广大民兵，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是义愤填膺。他们怒斥“第二武装”设置的牢房是“第二监狱”。随便抓人、关人比“苏联新沙皇”还坏，搞的全是“渣滓洞一套”。责问他们：八亿人

民通过的宪法，你们遵守不遵守，经毛主席批准颁发的《民兵工作条例》你们执行不执行，你们循的是那一家法，专的是那一家政？！

对于“四人帮”分裂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篡夺民兵领导权的罪行，总参谋部和南京军区都表示坚决的反对。一九七〇年九月，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还曾专程来到上海，准备解决民兵指挥部的问题。上海军民根据上级军事机关和领导同志的指示，为维护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完整性，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他们针对“四人帮”另立机构，要用指挥部代替人武部的行径，说：各区已经有了人武部，又要成立民兵指挥部，变成了两套机构，叫上级机关怎么领导。明确表示：这个指挥部没有必要存在。一九七二年，“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委，指令市民兵指挥部统管全市的民兵工作。警备区领导同志据理力争，表示：市民兵指挥部不能直接向人武部布置工作，向人武部布置工作要经过警备区。当时，正值日本首相田中来访，市指挥部的头目越过警备区，直接向郊县武装部布置工作，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郊县人武部的拒绝。一九七五年秋，“四人帮”指使其党羽进行“两部合并”的试点，妄图以此把区、县人武部一口吞掉，杨浦、卢湾两个区人武部的同志对去抓点的施尚英等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义正辞严地提出：1. 人武部编制是中央军委定的，地方无权取消；2. 你们搞合并，有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有没有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3. 为什么民兵指挥部单方面派调查组，强加在我们身上。人民防空办公室的同志还针对“四人帮”想吞并人防机构的野心提出：“全国人防工作是周总理亲自抓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机构，为什么要随便取消。”这些责问，把施尚英问得目瞪口呆，理屈词穷，不得不哀叹：“这个问题不简单，这里面有路线斗争。人家提的问题都是以军委扩大会议加强武装部为依据的”。长期以来，“四人帮”及其党羽对上海军民

同他们的斗争，一直感到十分恼怒，大骂这是对文攻武卫“不承认”、“不支持”、“老是反”。市民兵指挥部在一九七四年二月炮制的一份材料中也承认：“从文攻武卫成立一开始，就经历着尖锐的斗争”，“上海民兵在建设过程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很激烈”。

“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时，不少民兵单位和个人更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市民兵指挥部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开设叛乱指挥点时，该厂民兵在厂领导的支持下，秘密拍摄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现场照片，并派人到南京向领导同志作了报告。三五一六工厂人武部的同志，把所谓“战备”的反常现象及时向厂党委作了汇报，严格控制了武器弹药，并根据厂党委指示，要派往区民兵指挥部值勤的同志摸清情况，向南京军区领导机关作了报告。

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到上海以后，上海百万民兵奋起造了“四人帮”的反。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上海十万民兵隆重集会，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充分表达了上海广大民兵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在南京军区党委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军民迅速从“四人帮”手里夺回了民兵工作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恢复了上海警备区、各区、县人民武装部做民兵工作的传统。事实证明：在上海，死心塌地搞“第二武装”的，不过是“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亲信、爪牙，一度掌握了上海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大权的坏头头，以及混进上海民兵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而已。

现在，上海民兵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围绕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中心，按照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加紧生产，刻苦训练，努力把民兵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更好地建设四化，保卫四化作出新的贡献。

注①：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组期间，办公地点在淮海中路1469号。九天之后，就搬到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原英国领事馆内）。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普陀区两派斗争尖锐，王洪文动用“第二武装”压制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将指挥部机关迁至普陀区长寿路582号上棉一厂。后来，该地两派斗争趋于平息，且考虑地处偏僻，遂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五日迁至黄浦路20号（原苏联领事馆内）。一九七二年九月，市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办公地点迁到南京西路1418号。批林批孔以后，“第二武装”公开反军乱军，指挥部头目感到此地靠近上海警备区机关，对他们搞阴谋活动不利，于一九七六年五月间，仍迁回黄浦路20号。

注②：王承龙，文化大革命前系上海《支部生活》刊物的一般干部。一月反革命夺权后，一度成为上海市革会常委，是“第二武装”早期的头面人物之一。党的“九大”以后，因与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争权而下台。

注③：见一九七八年杨勇副总长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注④：钟定栋，原市监委干事，破落地主出身，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为王洪文等人赏识，“第二武装”横行十年间，始终充任主要角色，人称是指挥部的“土霸王”。粉碎“四人帮”之后，即受审查。一九八〇年六月宣布逮捕。

注⑤：郑惠仪，原市冶金局监委干事，“第二武装”的最早筹组者之一。文攻武卫一成立，即为领导小组成员，充任市指挥部党支部书记，先后掌管市指挥部的办事、组织等工作。

注⑥：李彬山，上海警备区原副政委。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投靠“四人帮”，从一九六九年一起，一直为“四人帮”具体掌管“第二武装”。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调离上海警备区，办学习班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改为隔离审查。

注⑦：吴立义，杨浦区人武部原部长。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支持王洪文造反而受到赏识。从一九七二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直担任市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粉碎“四人帮”之后，与李彬山一起调离警备区办学习班审查和隔离审查。

注⑧：周宏宝，原为上钢一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是王洪文在上海的小兄弟之一。“十大”中委。一九七三年底调任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七五年二月，“四人帮”阴谋组阁，调任国务院教育部负责人。

注⑨：施尚英，原为江南造船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中投机造反，在王洪文的提携下，一九七三年突击入党，历任江南造船厂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市总工会常委等职。一九七四年二月调任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粉碎“四人帮”之后，即受审查，一九八〇年六月宣布逮捕。

注⑩：印玉泉，原为南市发电厂工人。造反后历任厂党委委员、电管局工会常委、市总工会常委等职。一九七四年二月调任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具体掌管“第二武装”的组织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回单位接受审查，一九八〇年六月宣布逮捕。

注⑪：“联办”，全称“联合行动办公室”，专门为一九六八年“八·四”行动设立的，由市指挥部和公检法军管会联合组成，负责人为李彬山、姬应伍、张宝林、陈敢峰、胡永年。姬应伍是空四军原副军长，林彪反党集团粉碎后被逮捕。陈敢峰原为同济大学造反派头目，“九大”候补中委，曾任上海市革会副主任。胡永年原为“上体司”头目，打砸抢骨干分子。陈、胡两人在一九七八年间均被逮捕。

注⑫：“维办”，全称“市维护革命新秩序办公室”，设立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以文攻武卫



为主，和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会有关组办组成。主要负责人为王维国、李彬山、张宝林、钟定栋、刘志明(原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

(内部参考材料)

#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十七)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 目 录

### “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罪行材料

第一部分 抛出“文攻武卫”口号，拉起“第二武装”队伍	(1)
一、江青在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会议上抛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2)
二、张春桥要求成立“武卫”组织写给毛主席的信	(3)
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文件	(4)
四、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对上海“工总司”常委、委员的讲话摘记	(7)
五、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编印的《关于建立文攻武卫队伍的宣传提纲》	(8)
六、张春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在上海国庆筹备工作会议上有关组建“第二武装”的讲话	(9)
七、王洪文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大会上的讲话	(10)